



《三国志演义》赤壁之战叙述探索

陈 曦

摘 要:《三国志演义》在对赤壁之战的叙述中,不仅让诸葛亮而不是周瑜,成为孙刘联军的头号功臣,更在他身上注入纵横家、兵家、道士等不同文化内涵,使其为人行事与儒家思想颇多牴牾;孙、刘两家在战争过程中既有合作更有“暗斗”,小说当中鲁肃视角的设置,对“暗斗”发挥了奇妙的道德评判的功能;杀孔融、刘琮、刘馥等情节,则可视小说对曹操形象的反复抹黑,在凸显小说“拥刘反曹”立场的同时,更暴露出作者历史观的某些局限。

关键词:《三国志演义》;赤壁之战;诸葛亮;鲁肃;曹操;历史观

基金项目:解放军艺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重点课题“中国古代军旅文学史论”(7XY001-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13)01-0052-06

据统计《三国志演义》一共描写了40多场战役,100多个战斗场面,而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赤壁之战,罗贯中“抓住这场战争做了作品中最费苦心的虚构处理”,从而使得这部分内容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文学功力与文化视野。从第四十回至五十回,小说用了整整十一回的篇幅描述这场大战。犹如一位治兵有方的军事家,在敌我双方兵刃未接之际,便从“道”“天”“地”“将”“法”等重要维度作了高瞻远瞩的盘算,那么擅长战争叙述的罗贯中,在对这场大战下笔前拟出的文学虚构的“战略”指导原则又是什么呢?概括而言主要有三:一是让诸葛亮而不是周瑜,成为赤壁大捷的头号功臣;二是浓墨渲染孙、刘两家在战争过程中的“暗斗”;三是大力彰显“尊刘反曹”的基调,从战争伦理方面抹黑曹操。作者驳杂的文化价值理念,内蕴丰富的战争人物形象,以及独具匠心的战争写作艺术,便是立足于上述三大原则而渐次加以呈现的。

一

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之前出现的各种史传、诗词、戏曲、小说等,几乎均认为赤壁大捷的头号功臣非周瑜莫属。苏轼在其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不无欣羡地吟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灰飞烟灭。”《三国志平话》描写刘备在赤壁战后周瑜为他安排的黄鹤楼酒宴上,即兴书写短歌一首道:“天下大乱兮,刘氏将亡,英雄出世兮,扫灭四方。乌林一兮,剿灭摧刚。汉室兴兮,与贤为良。贤哉仁德兮,美哉周郎!”又赞曰:“美哉公瑾,间世而生。兴吴吞霸,与魏争锋。乌林破敌,赤壁鏖兵。似此雄勇,更有谁同?”周瑜在赤壁大战中的功绩无人匹敌,此乃沿袭已久的定论。反观诸葛亮,历史上他

对赤壁大战的贡献,在于其亲赴江东,游说孙权以联刘抗曹。使命一旦完成,他便退居幕后。据周兆新考证:“《三国志》完全没有提到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开始后干过哪些事。但战争结束后关羽被任命为襄阳太守,张飞被任命为宜都太守,诸葛亮仅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督察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军事,征调三郡的赋税以供军需,其官职并不高于关羽和张飞,由此推测,他在赤壁大战中的功劳未必大于关羽和张飞。”

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周瑜的桂冠却戴到了诸葛亮的头上,他成了赤壁大战首屈一指的主角。小说多次借诸葛亮之口彰显他的这一地位,所谓“吾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耳,但我一举手,则皆为齑粉矣。”(第四十三回)曹操引百万之众,被吾聊施小计,杀得片甲不回。”(第五十二回)然而历史的真实情状如何呢?须知,从战争主力来看,据《三国志》记载,孙权投入的兵力是三万,刘备却仅有两千,吴军的主力地位无可置疑,罗贯中对此无意颠覆;从作战成绩来看,赤壁战争中主要战斗武装是孙权的军队,刘备及其部属在决定胜负的水战中的作用不大”,罗贯中对此亦无意推翻。既然如此,诸葛亮又是如何成为这场大战头号功臣的?

罗贯中的写作策略是让诸葛亮在这场大战的关键环节,发挥无人可及的重要作用,诸如:大战之前,他比鲁肃、周瑜更能洞察孙权心曲,了解其一度“心尚未稳,不可以决策”(第四十四回)的缘由所在,最终让“寝食不安,犹豫不决”的孙权得以坚定与曹操决一死战的信心;曹、吴初始交兵,周瑜在三江口“虽得利,只恐寡不敌众,遂下令鸣金,收住船只”(第四十五回),贯彻的便是孔明“先挫北军锐气”的作战方针,因而“虽是周瑜之功,亦即孔明所教”。决战前,诸葛亮巧设奇谋草船借箭(见第四十六回),在短时间之内交付周瑜十万枝箭,从武器装备方面为作战胜利提供重要保



证赤壁决战周瑜实施火攻取得大捷,但若无诸葛亮的七星坛祭风(见第四十九回),化成灰烬的将是周瑜而不是曹操的战船,曹操兵败逃归,关羽有“义释”之举,此亦不出诸葛亮的“智算”(见第五十回),等等。于是乎,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无形中竟是一个导演的身份”,俨然成了制定作战决策、掌握用兵心理、拥有制胜法宝、左右战争结局的头号人物了。

然而,这个虚构出来的具有超一流智慧的“导演”,其精神面貌与诸葛亮的历史原型却出入甚大。据《三国志·诸葛亮传》与裴注记载,未出山前,诸葛亮喜欢“抱膝长啸”、“好为《梁父吟》”,可知生活于生灵涂炭的汉末乱世,青年诸葛亮“心中充满了一种慷慨悲凉之气。这长啸,这诗歌,应该寄托了他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和悲悯情怀。”出山之后,他面临的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局面,刘备集团被曹军追打得难以喘息,丢新野,弃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濒临覆亡险境。寻求建立孙刘联盟,已成刘备集团必须抓住的一线生机,诸葛亮向刘备道出“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的话语,清晰显示了赤壁大战前刘备集团的危如累卵。后来他在《出师表》中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词句,追忆了其当年临危受命之时如泰山压顶般的危机感与使命意识。相形之下,小说中的诸葛亮虽同样处于险境却全无这种苍凉与凝重,其所谓“吾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耳”、“吾虽居虎口,安如泰山”之类表述,以及“草船借箭”、“借东风”等行为,均显得过于轻松,远离实际。显然,这个赤壁大战的“总导演”纯属“罗氏制造”,身上闪烁着罗贯中涂抹上去的多种文化色彩。儒家、纵横家、兵家、道士等不同人格面具在诸葛亮脸上不停变换,影响着人们对其形象内涵的准确认知。“舌战群儒”时,他既是一位见识不凡的儒生,又是一位口若悬河的纵横策士;“草船借箭”时,他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料事如神、智慧超群的军事家;“借东风”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为呼风唤雨的道士。如果说以兵家或道士形象示人的诸葛亮更多展示了他的智慧,那么以儒家或纵横家面目出场的诸葛亮,则更多展露了他的人格内涵与价值理念。

与一心要把刘备塑造成“仁君”形象一样,罗贯中也试图赋予诸葛亮以程颐所谓“儒者气象”。小说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与吴地群臣唇枪舌剑,高举儒家学派的利器大战群儒。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君子之儒”不同于“小人之儒”。“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世,名留后世。”“忠君爱国”是“君子之儒”的必备品质。在汉末乱世,人所要“忠”的“君”是何许人?要爱的“国”是哪个国?这是不能不辨的问题。诸葛亮痛斥“汉贼”曹操为“无父无君之人”,训斥吴臣薛琬“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语境中的“君”与“国”,

均指的是汉献帝及其所代表的延续了将近二百年的东汉帝国。然而,诸葛亮效忠的对象是谁呢?《出师表》写得很清楚: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对其有知遇之恩的刘备及其主导下的政治集团,才是他的“君”和“国”,才是他一生鞠躬尽瘁拼死效力的对象。小说对于他在这方面的忠诚,描述得可谓淋漓尽致。如此说来,诸葛亮岂不是与他贬斥的曹操、薛琬别无二致,同属“无父无君”之辈吗?

诸葛亮“舌战群儒”时还多次使用儒家的核心范畴“仁义”,并两次称颂刘备的“大仁大义”,特录如下:

……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

诸葛亮在这里以儒家思想为旨归,一连两次称颂刘备“大仁大义”,显示了他对儒家伦理的高度认同。据此,他的言行理应与之步调一致,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小说中的刘备两次表现其“大仁大义”的时候,诸葛亮却跑调了,在道德方面沦为刘备的一个低矮陪衬,情形分别如下:其一,诸葛亮多次撺掇刘备抢夺刘表的荆州。比如第四十回写他向刘备建议:“新野小县,不可久居。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后来当刘备集团获知刘琮投降后,伊籍出主意道:“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类,则荆州属使君矣。”这不是怂恿刘备“乘乱夺同宗之基业”吗?诸葛亮闻听此论,立即附和:“机伯之言是也,主公可从之。”其二,刘备当阳之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与百姓相拥而行,行军速度迟缓,遭致曹军追击。嘉靖本写诸葛亮劝刘备丢弃百姓,逃命为上:“江陵要紧,可以拒守。今拥大众十余万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到江陵?倘曹操至,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以上可作为剖析诸葛亮人格内涵的典型案例。他劝谏刘备诈夺荆州时,恐怕已掩埋了孟子所谓“惻隐之心”,他劝谏刘备“暂弃百姓”时,或许已将“仁政”、“爱民”的概念抛至脑后;至于日后他以“大仁大义”赞扬刘备,大概未曾料到那首赞歌却隐含了对自己的嘲讽。“舌战群儒”时的诸葛亮俨然以“君子之儒”自许,但他的实际行为却与醇儒形象颇有距离。

二

小说中的诸葛亮并非醇儒,这种效果是罗贯中刻意实现的反讽吗?非也。罗贯中作为知识阶层中的一



员,儒家经典必当烂熟于胸,故而真诚地想让其笔下刘备集团的代表人物如刘备、诸葛亮、关羽等,成为儒家忠孝节义的代言人。但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的“有志图王”者,亲历了元末动荡,看惯了乱世人心,深知当时各路“英雄”往往弃儒家的仁义道德如敝屣。与儒者思想无法兼容的异质文化,特别是再度风靡元末的战国纵横策士的人生哲学,也因他的熟知与认可而被注入诸葛亮的肌体。于是,在“舌战群儒”一节,他除了让诸葛亮高举儒家旗帜之外,还对苏秦、张仪等战国策士不吝赞美之辞:“步子山以苏秦、张仪为辩士,不知苏秦、张仪亦豪杰也。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笑苏秦、张仪乎?”(第四十三回)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在这里高调颂扬苏秦、张仪,不仅显示了他对战国策士不凡业绩的欣赏,更说明了他对这些人所秉持的人生理念——“崇计”“尊时”“重利”——的认同与揄扬。

首先,罗贯中将战国策士在外交领域对计谋的高度尊崇,转移到兵家实战领域,让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以智服敌,神威大显。苏、张摇动唇舌,驰骋才智,做到“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战国策·齐策三》),说明出色的外交策略可以安邦定国,使各国暂时消除前嫌,熄灭战火。与苏、张相比,小说中诸葛亮的事迹更为神奇,他未动刘备集团的一兵一卒,便能向周瑜交出十万弓箭,还能不可思议地借来克敌东风。古代兵家历来有重视谋略的传统《孙子兵法》即有“上兵伐谋”的经典表述,但“伐谋”并非意味着“空手套白狼”,而是要以强大实力为后盾,否则“不战而屈人之兵”便会沦为海市蜃楼。诸葛亮仅凭智力便能克敌制胜,应属小说家的美好幻想。他比苏、张更具神机妙算,不仅在外交领域,更在烽烟弥漫的战场,演绎了一出“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诱人神话。

其次,战国策士的“尊时”“重利”思想也被小说中的诸葛亮所宣扬。时机到来,紧紧抓住,因势利导,掌握主动,所谓“时至而弗失”(《战国策·秦策三》)、“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战国策·齐策五》);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对此领悟透彻,演绎出色。小说第四十二回写刘备败走江夏,正与诸葛亮谋划抗敌良策时,人报“江东孙权差鲁肃来吊丧,船已傍岸。”诸葛亮瞬间明白鲁肃的“吊丧”只是幌子,他的真实意图是来联刘抗曹的。这对命悬一线的刘备集团可谓天赐良机,绝不可失。诸葛亮虽在鲁肃面前佯称刘备意欲投奔苍梧太守吴臣,并让刘备做出不许其与鲁肃同往江东的姿态,但这样做不过是欲擒故纵,吊鲁肃的胃口罢了。赶赴江东之后,他与鲁肃合力促成孙刘联盟的建立,从而为当

时羸弱的刘备集团得以最终挤进天下三强,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与“尊时”相关联的是“重利”。“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这一番话所透示出的人生观,看似不会被“舌战群儒”时口称仁义高调的诸葛亮所认可,实则早已暗渡陈仓,握手相拥。赤壁战后十余年他力促刘备登基“正位续大统”时,道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西蜀群臣拼死追随刘备的动机:“今主上所有文武官僚数百员,皆欲主上为君,共图爵禄,光显祖宗;不想主公坚执不肯,多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明确指出包括自己在内的群臣上下均奔“爵禄”而来,若不遂愿则必生怨心,各奔东西。若有学者敢于赞赏此时的诸葛亮具有“伟大人格”,则笔者估计其中必定含有揶揄的成分了。

显然,正是有了罗贯中的描述,赤壁之战才会成为诸葛亮一生当中最为耀眼辉煌的舞台。可在这个舞台上尽显才情的诸葛亮,其人格面目实与战国策士相类,为人行事与儒家思想颇多牴牾,但与纵横策士屡遭贬斥的历史命运大为不同的是,小说中的诸葛亮却被誉为“比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若追寻赤壁大战期间诸葛亮在道德高地上何以屹立不倒,则当考察罗贯中在贯彻其文学虚构的第二条“原则”时为诸葛亮增色添彩的写作谋略。

罗贯中为赤壁大战设置了“明争”与“暗斗”两个情节链条。相形之下,孙、刘两家的“暗斗”,比曹操与孙、刘联军的“明争”还要吸引读者的眼球。孙、刘之间的“暗斗”主要表现为周瑜屡使阴招,陷害诸葛亮。周瑜这样做固然出于几分“此人见识,胜吾十倍”的嫉妒心,但更多的则是着眼于社稷江山,所谓“今不除之,后必为我国之祸。”(第四十五回)孙、刘两家既已结盟,周瑜不但对诸葛亮磨刀霍霍,甚至对刘备也动了杀机(见第四十五回),无疑有亏道义,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诸葛亮在这方面与周瑜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早在与东吴结盟之前,诸葛亮就有如下“高论”：“曹操势大,不如往投东吴孙权,以为应援,使南北相持,吾等于中取利,有何不可?”(第四十二回)又说:“……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风,直至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乘胜以取江南可也”(同上),可见诸葛亮早有伺机吞吴之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早已打好。后来诸葛亮借荆州不还的失信之举,便是这种思想逻辑延伸下去的必然。因此周瑜、诸葛亮以及他们彼此代表的孙、刘两家,在结盟之后仍相互算计、摩擦不断,责任显然并不应该由周瑜一人承担,但作者明显地让道德天平向诸葛亮倾斜,周瑜则沦为谋害贤良、品德恶劣的小人。

罗贯中是如何实现这种褒贬有别的写作意图的?笔者以为鲁肃视角的设置,发挥了奇妙的道德评判的



功能。历史上的鲁肃乐善好施,深谋远虑,文武双全,是联刘抗曹方针的首倡者,裴松之对此有明确表述:“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三国志》注)可小说却把这位东吴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战略家,写成一个忠厚有余、智商不足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出使东吴期间,小说中只要他一出场,旁边几乎均有鲁肃的身影。而这时罗贯中便会暂时丢弃全知视角,而改用有限视角,从鲁肃的眼中映现诸葛亮的作为。此外,小说写周瑜在屡次决定对诸葛亮加以陷害时,鲁肃自始至终是其唯一的商议对象,除他之外东吴方面无人知晓周瑜这方面的心迹。须知,历史上的鲁肃在孙、刘联盟建立之后,便与诸葛亮一样退居此次战争的幕后,没有作为见诸史册了,但随着诸葛亮在小说中升格为赤壁大战的头号人物,随着孙、刘盟军内部的“暗战”被罗贯中凸显为两大情节主线之一,他也从历史的幕后走到文学的前台,扮演了一个全程参与“暗战”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承担了作者彰显其价值判断的重要使命。他来往于周瑜与诸葛亮之间,成为一种“双重反射性的棱镜”。这个棱镜不仅折射出了周瑜的“多妒”与诸葛亮的“多智”,以其呆傻之气为作品中的“严峻的冲突增加了一抹喜剧的、抒情的色彩”,更重要的是还充当了周瑜与诸葛亮思想行为的裁定者。小说写“(鲁)肃与瑜最厚”(第四十四回),彼此信赖,始终站在周瑜一方维护东吴利益。不过,每当周瑜意欲加害诸葛亮时,他不但及时制止,还反复提醒周瑜,陈说利害道:“今操贼未破,先杀贤士,是自去其助也”(第四十四回);“在今用人之际,望以国家为重”(第四十五回);“若杀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第四十六回)。在周瑜刁难诸葛亮而制造加害机会时,鲁肃甚至出于“不忍”之心暗中相助,无形中成为诸葛亮出奇制胜的帮手,比如若无鲁肃暗中调来船只人员,诸葛亮的“草船借箭”焉能完成?鲁肃瞒着周瑜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盟军间理应并肩抗敌而不应相互拆台的公义。

在小说家的人物谱系中,鲁肃“是个宽仁长者”(第五十六回),属于“至诚”“忠厚”“老实”一类(见毛氏父子在小说第四十四回与五十一回的回评)。这类人往往被认为值得信赖,有公信力。因而诸葛亮一旦被誉“贤士”“神人”,这一认知便已溢出了个人判断的疆界,而具有社会“公论”的性质了。他对诸葛亮的肯定、帮助与保护,实则凸显了这一意蕴,即诸葛亮手握道义旗帜。小说为诸葛亮设置鲁肃这一叙事视角,使其成为赤壁之战叙事伦理的风向标。正因为有了这一设置,诸葛亮才得以牢牢占领小说的道德高地,即使他秉持的是战国策士的人生哲学,为人行事绝非其口中揄扬的“君子之儒”。

罗贯中缘何选中鲁肃发挥小说的这一叙事功能?除了他是诸葛亮出使江东的推介者,且与周瑜关系深

厚,因而是勾连二人的最佳人选之外,还与鲁肃在元代戏曲中已然树立起来的儒者形象有关。查阅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其中无名氏的《周公瑾得志娶小乔》与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均有鲁肃不少戏份。前部戏中的鲁肃自称“幼习先王典教,颇晓吕望之书。祖宗积德,颇有钱财”,为好友周瑜的婚姻大事奔走在前后,慷慨解囊,成就了一段佳缘;后部戏中,鲁肃的政治立场虽与关羽不同,但却并非反面形象。戏中谴责关羽不还荆州的一段念白,充分彰显了他的儒者修养:

既然将军言“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借物不还者谓之怨。想君侯文武全材,通练兵书,习《春秋》、《左传》,济拔颠危,匡扶社稷,可不谓之仁乎?待玄德如骨肉,觑曹操若仇雠,可不谓之义乎?辞曹归汉,弃印奉金,可不谓之礼乎?坐服于禁,水淹七军,可不谓之智乎?且将军仁义礼智俱足,惜乎止少个“信”字,欠缺未完。再若得全个“信”字,无出君侯之右也。

以儒家的核心理念“仁”“义”“礼”“智”“信”衡量关羽的作为,言语温文尔雅,态度谦和恭敬,浓郁的文人味中略微散发出几分迂气,正与剧中气冲云霄的英雄关羽,构成不同人物类型间的鲜明反差。这个形象过度到罗贯中笔下的那位憨厚真诚的鲁肃,让他无形中成为周瑜、孔明之间矛盾冲突的道德裁判,理当不会引发读者的错愕与非议。

三

台湾军事史家钮先钟先生曾列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决定性会战,东汉末年爆发的这场赤壁之战赫然位居其中,入选理由是:“若无赤壁之战,则我国历史也就不会有所谓三国时代。”吕思勉先生对于此战的历史意义阐释得更为充分:“赤壁之战,是三国史事的关键。倘使当时没有这一战,或者虽有这一战而曹操又胜了,天下就成为统一之局而不会三分。所以这一战,实在是当时分裂和统一的关键。”自古以来我国史家便已形成了赞统一而斥分裂的传统。统一意味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建立,意味着经年不休的兵火浩劫与生灵涂炭的结束,故而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实乃苍生之不幸,历史之遗憾。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或赞美曹操觊觎天下的野心。

汉末大乱,王纲解纽,觊觎皇权的岂止曹操一人?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骄傲地宣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此语,实则道出了包括孙、刘两家在内的汉末军阀对皇帝宝座的蠢蠢欲动。罗贯中在小说内容还未进入到赤壁之战时,已经对此作了生动的展示。比如第六回写孙坚



在建章殿的井中捞得一玉玺,部将程普认为这是一种“天启”。“……近闻十常侍作乱,劫少帝出北岷,回宫失此宝。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孙坚以“汝言正合吾意”作答,野心从此被点燃。又如第二十回写曹操青梅煮酒,道破两人大志,所谓“包藏宇宙”、“吞吐天地”云云,实即主宰九州、称王称帝的另一种表述。

对于汉末军阀的帝王梦,罗贯中的褒贬态度迥然有别,在“拥刘反曹”的思想惯性支配下,他为刘备的美梦穿上了一件“复兴汉室”的堂皇外衣,而让曹操沦为遭人唾骂的篡汉奸臣。为了丑化曹操,作者不惜虚构史实,多次写其残暴无道的杀人行径。在整个赤壁大战期间,小说中的曹操极易上当,屡出昏招,给人以发挥失常之感,比如在明知已被蒋干的情报所误之后,仍派遣他出使江东并再次中计。罗贯中在降低曹操智商的同时,极力凸显了他的残暴,虚构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杀人情节。如果说杀蔡瑁、杀张允,显示的只是曹操在与周瑜斗智时的头脑短路,其中并无寄寓罗贯中多少道德评判的话,那么他先后杀孔融、刘琮、刘馥等情节,则可视为小说对曹操形象的反复抹黑,突出反映了罗贯中对其赤壁大战文学虚构第三条原则的精心贯彻。

孔融被杀事件见于《三国志演义》第四十回,小说正是在这一回拉开了赤壁大战的序幕。此回一开篇便写曹操定下“扫平江南”、“一统天下”的壮志,声称:“吾所虑者,刘备、孙权耳,余皆不足介意”,调集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队;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大中大夫孔融反对此举,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亲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

旗帜鲜明的反战态度,为孔融招来杀身之祸。由小说“曹操既杀孔融,传令五队军马,次第起行”的记述,可知孔融的被杀事件,被特意置于赤壁大战的开端。此举蕴含了作者的深意,值得细绎。参读《后汉书·孔融传》、《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可知孔融实际上是在曹操挥师南下的第二个月(即建安十三年八月)被“下狱弃市”的。身为“建安七子”之一,孔融文采过人,恃才傲物,奖掖后进,名重士林。站在维护汉室的立场,他对曹氏专权心怀不满,屡次“戏侮”曹操,讥刺时政。念及孔融在朝野的巨大声望,曹操虽心怀嫌恶,却一直有所顾忌,隐忍未发。率兵出征后,大概是孔融仍在朝中放言无惮,出于稳定后方的考虑,曹操才痛下决心,处死了这位名臣。孔融之死,其原因在于他身处曹操实际掌控的政权却又公然不与其合作。罗贯中虽也叙述了孔融对曹操的攻讦,但却将其死因与赤

壁之战直接挂钩,虚构了谏阻出兵的情节,并以“以至不仁伐至仁”之语,将曹操及其讨伐对象刘备、刘表、孙权等,分置善恶两端,褒贬分明。孟子曾拟构了“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战争模式,他心目中的“至仁”者为商汤文武等圣人;“至不仁”者则为夏桀殷纣等暴君。罗贯中套用孟子的这一理念,在将曹操打入暴君之列的同时,也将刘表、孙权、刘备等捧上圣人的云端。通观小说,被罗氏大力歌颂为明主贤君的只有刘备一人,刘表、孙权岂能有这份殊荣?罗贯中在上引文字的表述不当实属无奈。因为当曹操决定踏平江南时,刘备还只是刘表的一个部将,没有资格进入曹操讨伐的名单。他是在刘表幼子刘琮献出荆州而脱离其阵营后,才进入曹操讨伐视野的。罗贯中让刘备与刘表、孙权并列,成为曹操讨伐的一大目标,是为了夸大刘备集团在赤壁大战中的地位。理所当然进入曹操讨伐名单的刘表与孙权,没料到会沾了刘备的光,居然一时间拥有了圣人的光环,可博读者摇头一笑。大概是罗贯中这一表述的纰漏过于明显,毛氏父子专门在小说的第四十回夹评中补救道:“‘至仁’独指刘备,而表与权又在所轻。”道出了小说的真实意图所在。赤壁大战还未进行,罗贯中便通过孔融之死,构建了战争双方善恶对立的格局,美化了刘备的形象。曹军的败局则在此得以预示,原因亦得以点明,即战争发动者曹操的不仁不义与出师无名。

与孔融之死同样蕴含深意的还有对刘琮遇害的虚构。据《后汉书·刘表传》:“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操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可知刘琮投降后,并没有被曹操杀掉,而是被任命为青州刺史。虽无实权,却能安享年华,性命无忧。小说却虚构了曹操对刘琮的出尔反尔:他曾郑重承诺,一旦刘琮归顺,“便着他永为荆州之主。”(第四十回)之后又令蔡瑁、张允传话:“具言曹操许保奏将军永镇荆襄。琮大喜。”(第四十一回)可就在刘琮归降之日,曹操却以“青州近第都,教你随朝为官,免在荆襄被人图害”(同上)为由,逼迫刘琮及其母蔡夫人离开故地。在赴青州的路上,曹操派于禁追杀,杀死了刘琮母子。罗贯中之所以虚构刘琮的惨死,主要意图当然在于再次显露曹操的凶残暴戾,不讲信义。此外,还有如下一层寓意也深藏其中:“刘琮之事,即孙权前车之鉴。琮之臣王粲、蒯越等皆为尊官,而琮独见杀。权而降操,亦犹是耳。善乎!鲁肃之言曰:‘诸臣皆可降,惟将军不可降。’真金玉之言哉!”(毛氏父子第四十三回的回评)

原来,罗贯中虚构刘琮的被杀,是为了给鲁肃力劝孙权决一死战作铺垫。一旦像刘琮那样归降曹操,那么他的昨天就是孙权的明天,必将难逃曹操的屠刀。由此可知孙权的迎战,完全是为了一己之性命、一姓之权力。而刘备的奋然抗击,却被小说誉为匡扶汉室,动机可嘉,



其高大形象再次被衬托出来。如同前述孔融之死一样,刘琮被杀同样回旋着贬曹扬刘的主旋律,曹操的形象再一次被作者抹黑。实际上,历史上的曹操对待降将具有“大胆用降,量功行赏”的胸怀,割据一方的人物,如刘琮、张鲁等皆被封侯,张鲁甚至还被委以重任,拜为镇南将军(见《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当曹操意欲平定南方时,对待刘备与孙权的态度是有区分的。在吕思勉先生看来,对于曾经归顺投靠于他后又叛离的刘备,“(他的)投降曹操,曹操是必不能相容的,所以只得拼死抵抗。孙权和曹操,本无嫌隙,当时假使投降,曹操还要格外优待,做个榜样给未降的人看的。所以当时孙权假使投降,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而以孙权一家论,亦系莫大的幸福。”此论智哉!可惜罗贯中却站在了颂扬分裂的立场上描述这场大战,其久播人心的文学效果,造成的是历史观的长期误导,岂非憾事!

罗贯中历史观的缺憾还表现于赤壁大战的结局篇——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所谓“义释”之“义”,只是关羽出于报答曹操旧恩的私人情义,这种“义”相对于刘备集团口口声声所谓“安邦定国”“忧国忧民”之大义,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如若“大义”与“小义”不可兼得,则当舍小而就大。但罗贯中却对关羽的逆理之行充满了赞赏,并以诸葛亮之口为关羽开脱道:“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第四十九回)按照这种逻辑,曹操的命运由上天决定,故而关云长不杀曹操是合乎天意的,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有违世间大义亦可谅解。然而与这种承认并顺从天意的历史观形成对照的是,罗贯中又常常歌颂逆天而行的做法,颂扬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比如刘备明知请来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也是枉费心机,“徒费人力耳”,但仍不愿随顺天数,欲在乱世浊流中一展宏图(第三十七回)诸葛亮虽有上通天意的神奇能力,深知“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却不愿接受西蜀必将覆亡的命运,声称“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后出师表》)对于罗贯中既随顺天意权威又赞扬逆天而行的矛盾,一般论者往往关注后者,并称赏罗贯中寄寓其中的深沉感慨,所谓“在明知天命不可抗拒而奋起抗争中”刘备集团的悲剧英雄们所焕发出来的“力量、气概和风采”,但却忽略了罗贯中在服膺天命的层面上虚构出的一些富有喜感的败笔。关羽“义释”曹操当属此类。在这里,天意成了关羽的挡箭牌,曹操的逃归则成就了关羽的“义释”美谈,夷陵之战的尾声,黄承彦引导陆逊走出八阵图,亦可作如是观(见第八十四回)。罗贯中不惜利用天威以美饰西蜀阵营的

人情与“小义”,使得小说在天人关系层面已经打造出的厚重感被这些败笔遗憾地稀释。

注释:

郭瑞林:《三国演义的文化解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张作耀:《孙权传》,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毛宗岗在小说第四十五回的夹评,见《三国志演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08页。

林庚:《“赤壁之战”分析》,《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2期。

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参读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程颐:《二程遗书》卷十八曰:“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页,第775页。

周思源以“超凡智慧与伟大人格”概括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周思源:《周思源品赏三国人物》,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页),称“择主的谨慎是诸葛亮非常崇高的一种品格。”(傅光明主编:《插图本纵论三国演义》,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如朱鹤龄《战国策钞序》曰:“夫战国之亡以策士,策士之亡战国,则以利也。”陆陇奇《战国策去毒跋》曰:“《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

沈伯俊:《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孙绍振:《赤壁之战的魅力的奥秘——兼谈小说人物形象的心理结构分析方法》,《名作欣赏》,2002年第2期。

钮先钟:《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吕思勉:《吕著三国史话》,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2页,第82页。

参读张作耀:《曹操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

徐中伟:《徘徊于天人之间》,《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作者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史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李迎丰 卢雁